

重思泰戈尔翻译的“忠实性”问题*

[印度] 马蒂蕊 撰 林俊涛 译

摘要：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中国的翻译理论中，“忠实于原作”的观念一直是翻译的一种标准。然而在泰戈尔那里，这一原则变得复杂了。本文探讨了“忠实”的观念如何在泰戈尔诗歌悠久的翻译历史中运作，并聚焦于两个关键时刻：第一，泰戈尔将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以及这些英文诗歌在西方的接受情况；第二，冯唐在2015年翻译泰戈尔诗歌的相关讨论。将这两个时刻放在一起阅读可以表明，比起狭隘、准宗教式地遵循“忠实性”的翻译规范，更具创造性的试验作为一种翻译策略，实际上使泰戈尔的诗歌具备了“超强可译性”，从而获得在世界文学的地位。因此，一种广泛、实验性和动态的对“信”的理解——即一种复杂化了单一、稳定和权威性“原作”的观念——可能对阅读中国的泰戈尔至关重要。

关键词：泰戈尔 吉檀迦利 翻译 忠实性 冯唐

当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在20世纪10年代在国际上迅速成名时，全球的读者都赋予了他一个神圣的形象。在西方，泰戈尔被介绍为“东方圣人”或“先知”。相同的是，在泰戈尔于1924年展开的，为期四十九天著名的中国之行中，中国的报纸和期刊也宣布了“印度诗圣泰戈尔”的到来，赋予了泰戈尔“诗圣”的称号——这是一个传统上与唐代诗人杜甫（712—770）相关的称号，同时包含了“诗”和“神圣”的伟大。在中国，正

* 作者系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译者系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生。

如在西方一样，泰戈尔的名字和形象迅速与“东方精神性”这一概念紧密相连，这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观念，但泰戈尔和他的中国读者仍然利用它来表达他们自身的哲学和政治目的。^①与西方还类似的是，中国对泰戈尔的神圣化培养了一种人们对他诗歌的虔诚式的参与，其中既有热切吸取并传播其教义的追随者（如冰心和徐志摩），也有强烈的反对者和怀疑者。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泰戈尔在国际上的这种虔诚的被接受——人们将他视为信仰的支柱——实际上是由他在将其诗歌从孟加拉语翻译成英语时表现出的显著“不忠实”风格所推动的。众所周知，泰戈尔在其首部英文诗集《吉檀迦利》（于1912年出版，为他赢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中，以及在随后的几本英文诗集中（包括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于1916年出版的《飞鸟集》）都运用了大量的翻译自由。此外，在不少情况下，泰戈尔的英文诗歌并不直接对应他的孟加拉语诗歌，然而，海外读者对英文诗歌背后存在孟加拉语“原作”的想象，却进一步推动了他作为东方圣人形象的形成。

尽管泰戈尔在翻译自己的作品时采取了“自由”的做法，但他形象和作品的广泛、持续的神圣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固化出了一种“忠实”美学和伦理，类似于翻译话语中的“信”。这影响了后来的读者和译者如何对待他的诗歌。当小说家冯唐在2015年出版了《飞鸟集》的译本时，关于“忠实性”的争论成为了焦点。读者批评冯唐在翻译泰戈尔的诗歌时自由度过大，认为他违背了对“原作”的“忠实”翻译原则。然而，泰戈尔自己的英文翻译（即冯唐依赖的英文版本）本身就远非“忠实”——实际上，泰戈尔的英文诗歌本身就模糊了单一、权威的“原作”观念，即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作。对于那些批评冯唐译作的读者来说，这一事实似乎对他们毫无影响，他们不仅认为冯唐的《飞鸟集》违背了翻译的基本原则，甚至视之为对泰戈尔这一神

^① Gal Gvili, *Imagining India in Modern China: Literary Decolonization and the Imperial Unconscious, 1895-196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61-88.

圣人物的亵渎。

因此，泰戈尔诗歌的翻译史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忠实”翻译原则的机会。泰戈尔的神圣化现象突显了翻译话语中广泛存在的“原作”观念，即原作作为权威而几乎神圣的文本，翻译则被视为次要的、派生的、低于原作的，其成功不可避免地要以“忠实”作为衡量标准。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的那样，这种对原作与翻译之关系的二元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信”这一概念在圣经翻译和佛教传播的历史中具有双重起源。然而，泰戈尔的翻译方法则引导我们突破这种二元模式。第二部分回顾了泰戈尔在将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时所进行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上的实验，这种方法将“原作”去中心化，重新构建了翻译的地位。接下来的部分探讨了围绕冯唐译本的批评话语中对“信”这一概念的重新关注。本文通过将泰戈尔的翻译策略与冯唐的翻译进行对比，主张不应狭隘地、准宗教式地坚持翻译中“忠实”的规范，而是应当鼓励创造性的实验，这实际上使泰戈尔的诗歌具备了超越语言边界的“超强可译性”（hyper-translatability），从而获得了世界文学的地位。

一、翻译话语中的“忠实性”

在讨论泰戈尔诗歌的翻译史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忠实”这一概念在西方和中国翻译话语中的内涵。在西方，“忠实”这一概念的起源自然与《圣经》的翻译历程息息相关。^①公元一千年左右的早期翻译话语强调，神圣的文本“必须以极致的忠实来翻译，早期对这种忠实的理想形态是在逐行翻译（interlinear translation）中体现的，即

^①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每个词要与原文中的一个词相匹配”^①，就像词典一样。虽然这种忠实的理想形态在实践中被证明不易实现，但确保了《圣经》在任何语境中依然保持其神圣性，“作为超越时间、不可更改的文本”^②。因此，翻译实践圣经起源不仅在某种静态的语言等价观念中固定了忠实性，还赋予了“原作”以神圣的权威地位，使翻译必然居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这些价值观随后也影响了超出宗教领域的文本翻译方法。从圣经背景衍生出的忠实观念至今仍在许多主流和实际的翻译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往往赋予原作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使得所有的翻译尝试“至多被判定为相对忠实，最糟的情况则被视为彻底的亵渎”。^③

“忠实-自由”二分法是翻译思想中最古老的观念之一，其屡次被摒弃或仅仅表明这种观念在理解翻译时的不可或缺。早在1923年的《译者的任务》一文中，瓦尔特·本雅明就对这些术语在“任何有关翻译的讨论”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表示疲惫：“忠实与自由——在意义表达上的自由，并在为这种自由之服务中对词语的忠实——是所有翻译讨论中陈旧、传统的概念。然而，若是某种理论在译作中寻找的不是再创造的意义，而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么这些观念就己不再适用。传统上，忠实与自由这两个概念始终被视为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④在过去至少一个世纪里，拒绝借由“忠实与自由”——因而将此两者对立立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中——来理解翻译，已经成为翻译理论的主要支柱。然而，这些术语依然在主流的翻译参与和评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1990年，由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

① André Lefevere and Susan Bassnett, "Introduction: Where are w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ed.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p.2.

② Ibid.

③ Theo Hermans,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 New Paradigm,"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ed. Theo Hermans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p.7-8.

④ Walter Benjamin, "The Translator's Task,"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edaction*, vol. 10, no. 2 (1997), p.160. 原注此段基于张旭东的中文译本重译，译文有所调整。——译者

菲弗（André Lefevere）引领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运动中，其目标之一正是要解除“忠实”对翻译观念和标准的束缚。摆脱“日益空洞的‘忠实/自由’的对立”，需要认识到在不同的情境下，“忠实”可能会因译者所面临的各种动机和压力而具有不同的含义。^①通过拒绝“好坏”“忠实与不忠实翻译”的“旧评判标准”^②，文化转向的倡导者试图将注意力重新聚焦于“文本在其两种语境中的相对功能”，意识到“翻译从来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也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被接受的”^③。鉴于文化转向的广泛影响，以忠实为中心的假设以及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的语言间等价观念，已从大部分欧美翻译研究中逐渐消退。

同样地，翻译在中国的概念也与宗教实践紧密相连，尤其是在佛教从南亚向中亚和东亚传播的历史中。在中国的文献记录中，关于翻译实践的记载早于佛经翻译时期（始于公元2世纪中期），然而中文中沿用至今的“翻译”一词依然带有明显的佛教渊源。表示“翻译”或“解释”的“译”字可以追溯到《礼记》，但“翻”与“译”结合构成“翻译”一词，最初是专门用来指佛经的翻译。佛教僧人赞宁（919—1001）在其著作中对“翻译”一词有早期的解释：“翻也者，如翻锦绣，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④通过将翻译比作“翻过来的锦绣”，赞宁运用“审美愉悦的……生动的刺绣意象”，试图“将佛经翻译与外交翻译区分开来”（即“译”字的早期用途）并“提升佛经翻译

① André Lefevere and Susan Bassnett, "Introduction: Where are w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ed.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p.2.

② Bassnett, Susan and André Lefevere, "Proust'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ed. by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London: Cassell, 1990), 11.

③ André Lefevere and Susan Bassnett, "Introduction: Where are w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ed.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p.3.

④ Martha P.Y. Cheung, "'To Translate' Means 'To Exchang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Attempts to Define Translation ('fanyi)," *Target*, vol. 17, no. 1 (2005), p.35.

至文学文本的地位，因而将翻译的佛经经典化”。^①与《圣经》原文优于其译文的观念不同，赞宁的锦绣隐喻暗示了一种将经文翻译提高至经文本身的地位的努力，因而赋予翻译其权威性和正统性。

“翻译”一词不仅将佛教翻译与其他较为世俗的翻译实践区分开来，也逐渐给从事这类崇高翻译任务的译者带来了高度的责任和地位的要求。佛教僧人彦琮（557—610）的“八备”就明确体现了翻译实践如何将语言与学术的严格要求同佛教中的虔诚与德行理念结合起来。彦琮对译者的要求从对梵语和古代汉文的深厚知识，到致力于向他人传播佛教信仰和智慧以及戒律的修行。^②换句话说，僧人越虔诚，其翻译就越忠实。尽管“忠实”作为翻译先决条件的概念在后来的世俗翻译话语中逐渐淡化，但它作为翻译标准的功能仍然延续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文学翻译活动的鼎盛时期。1898年，著名学者兼译者严复（1854—1921）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难”——“信、达、雅”，这一标准至今仍具影响力。可以说，严复对“忠实”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佛教对“翻译”一词所蕴含的对佛法忠诚的渊源。

西方与中国对忠实的不同概念和态度，在泰戈尔的作品从孟加拉语到英语、从英语再到中文的传递过程中碰撞并交织在一起。与其按照“文化转向”的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摒弃“忠实-自由”的框架，泰戈尔的案例恰恰需要我们重新关注忠实与自由如何协同促进其作品的传播。一方面，这位“诗圣”的作品以忠实之名在翻译中传播，尤其因为泰戈尔亲自将作品译成英语——即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与译者之间不存在距离——他的英文作品便被视为忠实的翻译，消除了通常与翻译有关的那种怀疑和低劣感。然而，另一方面，泰戈尔采取了一种显著的“自由”翻译方法，将作品译为英文，反而通过一种翻译上

① Martha P. Y. Cheung, "'To Translate' Means 'To Exchang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Attempts to Define Translation ('fanyi')," *Target*, vol. 17, no. 1 (2005), p.35.

② Martha P. Y. Cheung, ed.,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142.

的“褻瀆”进一步推动了自己形象的神圣化。泰戈尔的翻译策略（如下部分所述）显示出这位诗人在通向世界文学殿堂的过程中，敏锐地在忠实与自由的潮流中游刃有余地行走。

二、泰戈尔的自我翻译策略

1912年，泰戈尔的首部英文诗集《吉檀迦利》在伦敦出版，书名页上标注了如下说明：“由作者根据孟加拉语原作翻译成的诗集”^①。读者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这本英文的散文-诗^②集翻译自1910年出版的同名孟加拉文诗集。然而，众所周知，英文版的《吉檀迦利》与孟加拉语原版有很大不同，因为“英文《吉檀迦利》仅与孟加拉语的《吉檀迦利》有勉强过半的重合：103首诗中有53首来自孟加拉文的《吉檀迦利》，其余的诗则选自其他10本书，其中并非所有都属于‘吉檀迦利时期’”^③。泰戈尔在英文《吉檀迦利》中选入的“其他10本书”包括《Naibedya》（1901）、《Kheyā》（1906）以及《Gītimālya》，后者在英文《吉檀迦利》两年后，即1914年出版。因此，部分出现在《吉檀迦利》中的诗作先以英文面世，后才在孟加拉语中出版。由此可见，这部为泰戈尔赢得诺贝尔奖的著名“原创”文本，从一开始就动摇了“原作”作为唯一且先于译本的概念。

泰戈尔的《飞鸟集》于1916年以英文出版。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视为《飞鸟集》作为翻译所根据的孟加拉语版本。相反，《飞鸟集》除了一些诗歌的英文版本，这些诗最早发表于泰戈尔的孟加拉文诗集《Kanikā》（1899），还包括了专门为《飞鸟集》创作的英文原创

① Rabindranath Tagore,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 (kondon: Chiswick Press for the India Society, 1912).

② 根据本文作者，《吉檀迦利》的出版史体现了复杂的文体问题，因此译者在此使用“散文-诗”以提醒读者此处文体的复杂性。——译者

③ William Radice, “Painting the Dust and the Sunlight: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Two Gitanjalis,” in *Gitanjali Reborn: William Radice’s Writings on Rabindranath Tagore*, ed. Martin Kämpchen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61.

作品。此外，该书与其他作品有着复杂的文本互涉关系，包括双语诗集《Lekhan》（1927，以孟加拉语和英文出版，涵盖了从1912年起创作的十年间的诗作）、原作为英文的《Fireflies》（1928），以及泰戈尔去世后出版的《Sphulinga》（1945）。因此，泰戈尔的《飞鸟集》复杂的出版历史和文本互涉网络，实际上进一步质疑了“原作”及“原意”的观念。当人们越是试图界定一个原作，文本就越是逃脱这一界定，进而否定这一尝试。

泰戈尔在自我翻译时的择取过程，表明了他对作品即将进入的英文市场以及西方读者对“东方”诗歌的期待有着敏锐的理解。从他写给朋友、出版商和读者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尽管泰戈尔对他们的品位有所批判，但他明确地试图触及并满足这一新兴读者群体。关于作品的翻译，泰戈尔在1922年一封信中写道：

我认为在英语版本中，有些部分 [……] 可以省略掉，这样比较好，因为我发现英语读者对他们不熟悉的场景和情感几乎没有耐心；他们对不理解的东西感到一种抱怨——他们不想去理解任何与他们熟悉的世界不同的东西。^①

泰戈尔准确预见到西方读者会欣赏一位“东方圣人”所写的虔诚和灵性诗歌，因此他特意在英文《吉檀迦利》中选择了符合这一特征的诗篇，正如森（Nabaneeta Sen）所言：“与泰戈尔用孟加拉语创作的庞大作品相比，他特意为西方读者挑选的内容非常有限。这些作品……是精心挑选的，旨在用灵性和平静洗涤欧洲。”^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说泰戈尔迎合了西方读者对东方神秘主义者的旺盛需求，这一策略使他在英语世界中既新鲜又熟悉。

① Mahasweta Sengupta, *Colonial Poetics: Rabindranath Tagore in Two Worlds*, PhD diss., pp.132-133.

② Nabaneeta Sen, “The ‘Foreign Reincarnation’ of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5, no. 2 (1966), p.283.

除了对所翻译诗歌的择取策略外，泰戈尔在自我翻译中还展现了他对形式的精心处理。事实上，泰戈尔的英文翻译在形式上与孟加拉语原作的差异最为显著。一些学者认为，泰戈尔在将每首孟加拉语诗作译成英语时都采取了极大的自由度，以至于这些诗往往被“重写”而不仅仅是被“翻译”^①。考虑到泰戈尔的形式翻译策略，有必要重温英文《吉檀迦利》书名页上的描述，即将“歌”（song）翻译为“散文诗”（prose）。泰戈尔最初创作的孟加拉语“颂歌”至今仍广泛传唱于全球孟加拉语社区，他在创作时特别考虑了歌曲的吟唱性。而在他的英文翻译中，泰戈尔却将这些“歌曲”以散文形式呈现，去除了它们的音韵特征，而着重传达诗歌的整体含义。例如，孟加拉文《吉檀迦利》中第151首诗的首句是：

প্রেমের হাতে ধরা দেব
তাই রয়েছি বসে;
অনেক দেবী হয়ে গেল
দোষী অনেক দোষে।^②

在泰戈尔自己翻译的英文里，这一句是：

I am only waiting for love to give myself up at last into his hands.
That is why it is so late and why I have been guilty of such omissions.^③

我只在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这是我迟误的原因，我对这延误负责。（冰心译）

① Sujit Mukherjee, *Translation as Discovery and Other Essays on In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p.103.

② Rabindranath Tagore, *Gitanjali* (গীতঞ্জলি), 3rd ed. (Allahabad: Indian Press, 1913), p.172.

③ Rabindranath Tagore,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

而在威廉·拉迪斯（William Radice）努力再现孟加拉语诗歌形式的翻译中，这句诗如下：

I'm waiting to hand myself over
to Love.
It's late in the day, and I know all the faults
I have.^①

在《飞鸟集》中，那些从孟加拉语诗集《Kanikā》翻译过来的诗有时几乎难以辨认；泰戈尔甚至形容他的孟加拉语诗与其英文版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除非我告诉你的是哪首诗，否则你甚至无法辨认出来”^②。事实上，《飞鸟集》中的英文“箴言”大多是对孟加拉语诗进行大幅删减后的散文翻译，有时甚至是“原作的部分翻译”，或者是“将同一首诗的不同部分分开，用于创作两首独立的译诗”，或者是这些策略的组合。^③例如，《飞鸟集》第71首诗在泰戈尔自己翻译的完整版本中是这样的：

The woodcutter's axe begged for its handle from the tree.
The tree gave it.^④
樵夫的斧头，问树要斧柄。
树便给了他。（郑振铎译）

① Rabindranath Tagore,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 trans. William Radic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1), p.49.

② Mahasweta Sengupta, *Colonial Poetics: Rabindranath Tagore in Two World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1990), p.137.

③ Sujit Mukherjee, *Translation as Discovery and Other Essays on In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New Delhi: Allied Publishers, 1981), p.103.

④ Rabindranath Tagore, *Stray Bird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7).

这首诗源自于《Kanikā》的第十三首诗，在威廉·拉迪斯的翻译里是这样的：

Politics

Said the axe to the sal-tree, 'Do me a favour:
I have no shaft – please give me some timber!'
At once a shaft was made from a bough.
Did the axe have to act the beggar now?
He struck at the trunk with wild aggression.
The tree, poor thing, met total destruction!^①

政治

斧头对沙罗树说：“帮帮我吧！
我没有斧柄——请给我一些木料！”
很快，一根树枝被制成了斧柄。
现在斧头还需要装成乞丐吗？
它疯狂地砍向树干，
可怜树，最终被彻底摧毁！（译者自译）

在孟加拉语原文中，这首诗讲述了一棵树发了慈悲，借给斧头一根树枝作为斧柄，结果这棵树却被斧头无情地砍倒。1922年，郑振铎首次将《飞鸟集》译成中文（至今仍被认为是权威译本），忠实地遵循了泰戈尔的英文版本，因此省略了诗中暴力的结局，以及未被提及的标题“政治”（rāstranīti）。在孟加拉语中，这一标题将诗歌转化为对政治残酷性的评论，而泰戈尔使用 rāstranīti 一词（意为“国家政治”，不同于更常用的 rājnīti）暗示对某种自我毁灭式的民族主义的批判。这种

① Rabindranath Tagore, *Particles, Jottings, Sparks: The Collected Brief Poems*, trans. William Radice (London: Angel Books, 2001), p.42.

细微差别，在英文及后来的中文译本中不可避免地消失了，使得泰戈尔在海外呈现出一种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形象，这又进而强化了他的精神象征形象。

在风格方面，泰戈尔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欣赏——其中包括济慈、拜伦、雪莱和华兹华斯——深深影响了他将作品自译为英文的方式，以至于“当他用英文写作时，亦模仿了浪漫主义的表达方式”^①。在英文版《吉檀迦利》中，泰戈尔使用了浪漫主义风格的古典英语表达，正如他在自我翻译中的一段所呈现的那样：

I know not how thou singest, my master! I ever listen in silent
amazement.

The light of thy music illuminates the world. The life breath of thy
music runs from sky to sky.^②

我不知道你怎样地唱，我的主人！我总在惊奇地静听。

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你的音乐的气息透彻诸天。（冰
心译）

相比之下，森古普塔（Sengupta）对这段孟加拉语诗句的英文翻译则是：

How do you sing genius

I am amazed to hear and hear.

The light of your music fills the world,

The wind of your melody fills the sky.^③

① Mahasweta Sengupta, *Colonial Poetics: Rabindranath Tagore in Two Worlds*, PhD diss., p.139.

② Rabindranath Tagore,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

③ Mahasweta Sengupta, *Colonial Poetics: Rabindranath Tagore in Two Worlds*, PhD diss., p.140.

在泰戈尔的英文中，*thou*、*thy*、*singest* 以及 *I ever listen* 这样的词句将他的诗置于早期的诗歌传统之中，而非更符合现代主义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而后者，才更接近 1912 年英文版《吉檀迦利》发表时的文学潮流。对于威廉·巴特勒·叶芝和埃兹拉·庞德而言——他们都是泰戈尔在西方的早期读者——会认为，这种带有时代错位的风格强化了东方主义中的观念，即东方是一个恒久的古老智慧之源。的确，叶芝和庞德都曾以这种方式在西方推广泰戈尔的诗歌。

这样看来，泰戈尔在作品选择、形式和风格上的自我翻译策略共同形成了一种“带有圣经韵味的散文-诗（*prose-poetry*），极易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因为它不受任何特定诗歌形式”，甚至不受文化背景的束缚。^①作为一种在翻译中进行创造性自由处理的极端个案，许多人认为泰戈尔的英文自我翻译“按照今天的标准难以被辩护”^②。事实上，在讨论泰戈尔的中文翻译时，学者们很少将他的英文诗歌视为真正的翻译，更多地倾向于将英文视为独立的原创作品。将泰戈尔的英文称为“原作”而与孟加拉语割裂，似乎在最初是一个无可厚非且便捷的选择。毕竟，泰戈尔是自己翻译自己作品的人，这样做的好处是似乎早已赋予了自己的翻译先天的合法性。随后的一波译者也是通过英文接触他的作品，把英文诗歌当作原作来进行他们的翻译。

重新审视泰戈尔的英文“原作”概念，可能会有所帮助。首先，泰戈尔的国际声誉不仅仅源于他的诗作可以通过英语被更多人接触到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他有意地运用了特定的翻译策略，精心塑造了一个既符合西方审美又富有吸引力的东方化形象。其次，泰戈尔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正是基于他非西方的身份，即作为一位同为亚洲的诗人。1924 年，梁启超在介绍泰戈尔的演讲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① Susan Bassnett, "The Self-Translator as Rewriter," *Self-Translation: Brokering Originality in Hybrid Cultur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22.

② Aarthi Vadde, "Putting Foreignness to the Test: Rabindranath Tagore's Babu Englis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65, no. 1 (2013), p.18.

他劝勉中国观众不要像“欧美社会”那样“无意识崇拜偶像”泰戈尔，而是因为“他从我们最亲爱的兄弟之邦——印度来”^①。虽然中国诗人因无法阅读孟加拉文而只能通过英文接触泰戈尔的作品，但他们对泰戈尔的兴趣却来源于他的亚洲身份以及非英语的原作，而英文便为他们提供了接触这一原作的途径。

如前文所述，泰戈尔的英文诗歌并未模糊或彻底脱离其孟加拉语作品，反而凸显了它与孟加拉语创作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泰戈尔的案例展示了如何能够动摇“作者/译者”“原作/翻译”“忠实/自由”等在世界文学和翻译研究中的固有二元对立。

三、冯唐的《飞鸟集》

小说家冯唐于2015年推出的《飞鸟集》译本，再次引发了对翻译忠实性问题的关注。冯唐的译本并非《飞鸟集》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也从未宣称自己是权威译本，却引发了一桩国际丑闻。该译本于2015年7月问世，至12月已成为中国的热门争议话题，先是在网络上引发讨论，随后蔓延至出版界。月底，出版社决定下架该书，并撤回所有线上和线下的销售，理由是遭到了读者的强烈不满和抗议。^②随着2016年1月新德里世界书展的临近，此次争议也逐渐在印度媒体中引发关注。中国是此次书展的“主宾国”，原定冯唐在书展上就他的《飞鸟集》译本发表演讲，但最终因中方合作伙伴的要求被迫取消。^③

冯唐并非第一次卷入争议，他在2000年代初进入中国文坛时便因其大胆露骨的写作风格而引起关注。大部分对他《飞鸟集》译本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一特点，即读者认为他在翻译中融入了他标志性的性化

① 梁启超：《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晨报副刊》1924年5月3日第1版。

② 罗昕：《冯唐回应译本〈飞鸟集〉被下架召回》，《澎湃新闻》2015年12月28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14024, [2024-07-13].

③ Ananth Krishnan, “Lost in Translation,” *India Today*, 2016-01-18, [2024-07-13].

风格。批评者指责冯唐使用过度性化的语言和俚语，使泰戈尔的诗歌变得“低俗”，既亵渎了泰戈尔，也糊了诗作的原意。批评者经常引用的一句争议性译文是泰戈尔原作中的“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而冯唐的译文则为“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正如评论家周黎明所言：“在给作品加上独特个性与哗众取宠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限。而当冯唐把泰戈尔的平静诗句变成了荷尔蒙浸透的低俗的自我写照时，他显然越过了这条界限。”^①

冯唐所谓的“翻译罪行”之所以显得更加严重，是因为在中国文学界，泰戈尔享有崇高的地位。中国作家和读者对泰戈尔的敬仰固然深厚，但与他在印度，尤其在孟加拉文学界所占据的至尊地位相比，尚有所不及。因此，当2015年的翻译争议爆发后，印度媒体和批评者将此事视作“对他们文化大使的亵渎”^②。亵渎一词突显了泰戈尔在印度文化中的神圣地位，这不仅源于他在文化界的卓越地位，也与他自我塑造为圣人般的形象以及这一形象在国外的接受度密切相关。历史学家沈丹森（Tansen Sen）指责冯唐漠视了泰戈尔作品的历史和意义：“很明显的，他对印度人（还有中国人）对泰戈尔和其作品的尊敬，没有任何敏感度。”^③

通过性化的语言翻译这位“诗圣”，冯唐因此被指控“亵渎”了一位神圣的文学人物，仅仅因为与这种低俗的性表达和网络俚语产生关联，便被视为对泰戈尔及其所象征的圣洁的一种冒犯。这样的道德失范也被视为翻译上的错误，因为批评者认为，泰戈尔所唤起的虔诚之心应当对应于翻译中的忠实之道，用以评估冯唐的《飞鸟集》。例如，《人民日报》的文章开篇便援引严复的“信达雅”三难作为评价标

① Raymond Zhou, “Lust in Translation,” *China Daily*, 2015-12-21, https://usa.chinadaily.com.cn/epaper/2015-12/21/content_22763870.htm, [2024-07-13].

② 罗皓菱：《冯唐谈〈飞鸟集〉》，《北京青年报》2016年1月22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m/cul/2016/01-22/7727834.shtml>, [2024-07-13].

③ 沈丹森：《亵渎泰戈尔的译本》，《联合早报》2016年1月16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60116-571604>, [2024-07-13].

准。文章指出冯唐最大的失败在于“信”的方面，认为他“违背了原作的原意”，将个人风格凌驾于原作之上，甚至“不惜……扭曲原文之意”^①。沈丹森的评论同样将翻译视为一种忠实的实践：“所有翻译，即便并非逐字逐句，也至少应传达原作的精髓。”^②他认为，冯唐的《飞鸟集》“显然不算翻译，无论是逐字逐句的意义的转换还是作为一种诗意的诠释”^③。面对争议，冯唐发表了一封致泰戈尔的公开信，呼吁从“忠实”的束缚中获得“自由”：“我想追求的是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你的诗的自由，以及在翻译中表达自己解读的自由……我希望保留自己使用，甚至创造属于我自己的中文系统的自由。”^④

对冯唐的批评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他的译本在被认为破坏泰戈尔神圣形象的同时，也被视为对翻译忠实性原则的攻击——这一原则随后又作为评判翻译的标准而被引述。冯唐的批评者不该被责怪，因为他们未能将冯唐视为泰戈尔诗歌“自由”译者序列中的最新一员，这反映出泰戈尔神圣化形象在其读者心中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泰戈尔的个案提醒我们，有必要将自由与忠实的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辩证的而非相互对立的关系。

结 论

本文并非为了重新评判冯唐翻译的优劣，而是为了探究这场争议所揭示的翻译观念和标准。与其简单地评判“好”或“坏”的翻译，

① 《莫借“翻译”行“篡改”》，《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4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m/cul/2015/12-24/7685442.shtml, [2024-07-13].

② Tansen Sen, “The Belittling of Tagore by Chinese Novelist”. *The Times of India*, 2016-01-24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china-man/the-belittling-of-tagore-by-chinese-novelist/, [2024-07-13].

③ 同上。

④ Feng Tang, “My ‘Vulgar’ Tagore Translation has been Suppressed—But I Should have the Freedom to Use Language as I Wish”. *The Guardian*, 2016-01-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jan/15/my-vulgar-tagore-translation-has-been-suppressed-but-i-should-have-the-freedom-to-use-language-as-i-wish, [2024-07-11].

更有意义的是，将关注点放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促进文本走向“国际化之路”上，正如冯唐曾调侃地描述此事件那样。^①作为“走向国际”的典型案例，泰戈尔的声誉无疑受到他神圣化的形象和作品精神性的推动，从而在读者和译者对待其作品的方式上，形成了一种忠实性的美学。这种神圣化的文本与忠实性翻译标准的结合，可追溯到宗教文本翻译的历史，而正是这一背景催生了大量翻译理论的来源，如前文所述。

然而，泰戈尔诗歌持续激起的那些关于忠实性的话语，恰恰是基于泰戈尔本人在将孟加拉语作品翻译成英语时，对“忠实”这一概念的明显忽视。泰戈尔在自我翻译中表现出的显著的自由，使得将其英文诗歌视为稳定且权威的“原作”显得颇具讽刺意味。将泰戈尔的英文诗歌视为翻译作品——即视之为泰戈尔精心设计和慎重考量的翻译成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续的译者如何追随泰戈尔的步伐，在狭隘和简单地追求不同语言间的对等之外，重新定义“忠实”，并将“忠实”与“自由”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本文重申了近年来翻译理论的许多观点，这些理论质疑了“作者”对文本拥有译者不可企及的独特权威，以及“原作”作为一种稳定、单一且权威文本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原作”天生优于译本。本文质疑将泰戈尔的英文作品视为唯一稳定的“原作”，并要求后续所有译本都忠实于此的普遍观念，同时建议对泰戈尔的译本（包括他自译的和他人翻译的）进行一种更为广阔、动态的对“信”的理解。泰戈尔的文本在翻译旅程中反复表明，是“自由”孕育了“忠实”，反之亦然，“忠实”为“自由”的实践创造了必要条件。因此，本文呼吁在翻译理论中重新定义“信”，使其反映出“忠实”与“自由”之间持久而活跃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必然贯穿于每一次翻译之中。

① 罗皓菱：《冯唐谈〈飞鸟集〉》，《北京青年报》2016年1月22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m/cul/2016/01-22/7727834.shtml>, [2024-07-13].